

激活新质生产力动能 培育新型消费增长极

□ 谢 琦

“十四五”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为消费升级奠定了坚实基础。即将到来的“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仍面临一些现实课题,区域、领域之间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有待进一步破解,特别是有效需求不足,已成为推动经济良性循环需要着力克服的制约因素。新质生产力作为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具有高质量高效能特征的先进生产力形态,不仅是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更是驱动新型消费的根本动力。新型消费以数字化、绿色化、品质化、个性化为显著特征,是消费升级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必然产物。二者的深度融合既符合“供给创造需求、需求牵引供给”的经济规律,更是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实践路径。因此,探索新质生产力赋能新型消费的内在逻辑与实现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新质生产力赋能新型消费的内在机理

技术创新重构消费供给体系。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通过基础研究突破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品形态、服务模式与供给效率的全方位升级。在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技术迭代速度持续加快,产生了智能终端、绿色产品、健康服务等新型消费供给。例如,人工智能

技术的突破推动“人工智能+”行动全面实施,使智能家居、智能穿戴、智慧医疗等消费场景广泛普及;新能源技术的成熟降低了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等绿色消费品的成本,为绿色消费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生产模式向柔性化、定制化转型,能够精准匹配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实现“按需生产”,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供给与消费需求脱节的问题。

产业升级拓展消费场景边界。新质生产力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促进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与现代农业深度融合,为新型消费场景的创新提供了产业支撑。例如,低空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低空旅游、短途通勤等新型消费场景。在家庭消费场景中,人形机器人产业与养老、教育、家政等服务业的融合,创造了“家庭智能陪护”“个性化教育助手”等新型消费场景,通过搭载健康监测、情感交互、知识科普等功能模块,人形机器人可为老年群体提供24小时健康预警与陪伴服务,为儿童提供定制化学习辅导,将消费场景从商业空间延伸至家庭私密场景,满足居民对高品质生活服务的升级需求。

需求牵引强化消费升级动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优化了消费供给,更通过提升居民收入水平、转变消费观念,从需求端为新型消费注入持续动力。同时,科技创新带来的生活方式变革,推动消费观念从“物质满足”向“精神享受”“品质提升”转型,绿色消费、健康消费、智能消费

等新型消费理念深入人心,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

新质生产力赋能新型消费的实践路径

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强化新型消费供给能力。一是集中力量突破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基础理论与核心算法,提升消费产品的智能化、便捷化水平,推动智能家居、智能交通、智慧零售等业态创新。二是加快新能源型、新材料、生物制造等领域技术产业化应用,扩大绿色消费品供给,满足绿色消费需求。三是完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机制,布局建设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加大应用场景开放力度。

以产业融合为抓手,拓展新型消费场景空间。一是深化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服务型制造、工业旅游等业态,推动消费从产品消费向“产品+服务”消费升级。二是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发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型消费模式,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三是促进文旅、农业、康养等产业融合,开发特色消费场景。

以需求升级为导向,培育新型消费重点领域。一是发展绿色消费,推广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完善绿色消费激励机制。二是关注健康消费,提供个性化健康监测、远程医疗、养老护理等服务,满足居民健康需求。三是支持数字消费,推动人工智能与消费领域深度融合,发展数字内容、在线教育、远程办公等消费业态,提升消

费的便捷性与体验感。

新质生产力赋能新型消费的政策保障

强化顶层设计与规划协同。一是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统筹科技、产业、消费、财税、金融等政策,形成工作合力,避免政策碎片化。二是加强区域协同,依托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打造新型消费先行示范区。三是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扩大服务业、数字领域开放,提升新型消费国际化水平。

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一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消费领域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的投入,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二是完善税收优惠优惠政策,对新型消费领域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给予税收优惠,激发经营主体活力。三是加大对消费领域科技创新企业的信贷支持,鼓励金融机构开发消费信贷产品,支持居民合理的消费需求。

加强消费环境治理与权益保护。一是完善新型消费领域法律法规,明确平台责任与消费者权利,填补监管空白。二是加强市场监管执法,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规范市场秩序;建立健全消费领域信用体系,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三是畅通消费者维权渠道,完善消费纠纷在线调解、仲裁机制,简化维权程序,降低维权成本。

（作者单位：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经济学院）

□ 侯建峰

当前,我国民办高校正处于分类管理改革深化的关键阶段,发展方式加快从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转变。然而,部分学校长期积累的债务风险也在持续显性化。近年来,多起民办高校资金链断裂事件不仅严重影响学校正常办学秩序,更直接侵害了师生合法权益,成为影响民办高等教育稳健发展的突出短板。有效防控债务风险、切实保障教育权益,已成为推动民办高校高质量发展的紧迫任务。本文围绕风险防控与权益保障两大核心,探讨构建协同治理框架的实现路径。

分类管理背景下债务风险呈现新特征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深入推进,民办高校划分为非营利性与管理性两类,其发展的底层逻辑与风险生成路径发生显著变化,债务风险亦呈现出差异化、复杂化的特征。

对于非营利性民办高校而言,“公益属性”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强化了学校立德树人的使命导向;另一方面,限制了其融资渠道,使其难以进行股权融资,过度依赖银行信贷,导致债务结构单一、偿还压力集中。此外,部分学校治理结构不健全,“一言堂”现象依然存在,重大投资决策偏离教育规律,一旦生源出现波动,极易引发流动性危机。社会对这类学校“不能倒闭”的预期,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市场约束。

营利性民办高校风险则更具金融化特征。在资本逐利性的驱动下,举办者可能倾向于运用财务杠杆加速扩张,融资工具更为多元,债务链条长、成本高、隐蔽性强。风险与资本市场波动和举办者战略决策高度关联,一旦市场环境变化,风险可能急剧爆发。实践中,若学校法人财产权制度执行不严,容易导致学校资产与举办者个人或关联企业资产边界不清,使学校实际承担举办者的债务风险。近年来,个别学校因资金链断裂导致运营困难的案例,正是这些风险的现实反映。由此可见,无论是哪类民办高校,如果其债务风险都已超越了单纯的财务范畴,将会对学校健康运行带来严峻挑战。

债务危机对师生权益的深层次侵害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民办高校的债务问题不仅是财务风险,更是关乎师生切身权益的社会问题,风险一旦爆发,最终代价往往由教师和学生承担。

对教师群体而言,最直接的侵害是劳动报酬权难以保障。学校账户因举办者其他债务纠纷被司法冻结,导致工资停发、社保断缴,已成为危机中的突出问题。这不仅严重影响教师生计与职业尊严,导致骨干人才流失,更会触发“师资流失—教育质量下滑—生源减少—财务恶化”的恶性循环,最终危及学校的生存根基。同时,教师在财务决策中的民主参与权和监督权虚化,使其难以在风险萌芽期形成有效制约。

对学生而言,权益侵害则是多维度、深层次的。极端情况下,学校停办直接导致受教育权被实质剥夺,即便协调转学,也面临专业不对口、学分难认定等现实障碍。在债务压力下,学校可能削减教学投入,导致教育质量缩水,学生付出了学费却未能获得相匹配的教育服务,公平交易权受到侵害。此外,学校财务状况不透明,也侵犯了学生及家长的知情权与选择权。从长远看,动荡的校园环境和下滑的教育质量,更会对学生的知识建构、能力培养乃至未来职业发展造成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

构建“法治—监管—权益”三位一体的协同治理框架

面对分类管理带来的新挑战,亟需构建以法治为基础、以精准监管为手段、以权益保障为核心的协同治理框架,系统防控债务风险,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底线。

夯实法治根基,强化法人财产权的刚性约束。法人财产独立是民办高校稳定运行的制度基石。要严格落实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关于法人财产权的规定,确保举办者投入、财政扶持、社会捐赠及办学积累全部清晰界定并登记于学校法人名下,从源头上杜绝资产混同。完善办学资金监管机制,全面推广专项资金专用账户与银行第三方共管模式,确保学费等收入优先用于保障教职工薪酬和基本办学开支。司法层面也需进一步明确民办高校法人财产的独立性,规范举办者债务纠纷时的执行程序,避免因不当查封冻结而影响学校正常运转。

实施分类精准监管,健全全链条风险预警干预体系。监管应体现分类施策原则。对非营利性高校,监管重点应放在维护其公益属性上,严格监督资产权属、结余使用和重大债务资金流向,防止资产流失和低效投资。对营利性高校,则应参照经营主体,强化信息披露,特别是关联交易、对外担保等关键信息的强制公示,实施“穿透式”监管,严厉打击利益输送行为。在此基础上,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牵头搭建跨部门的风险监测大数据平台,设定科学预警指标,实现对风险的早发现、早预警。对触发预警的学校,要采取从风险提示、约谈到限制招生、强制提取风险储备金等阶梯式干预,防止风险发酵蔓延。

坚持权益优先,完善托底式保障与救济体系。治理体系的根本价值在于保障人的权益。要构建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的权益保障网。事前,可探索建立师生权益保障风险储备金制度,为危机应对提供物质基础;推行学费账户与薪酬支付的联动机制,确保教师工资支付渠道始终畅通。事中,要明确在学校终止清算时,教职工劳动债权(工资、社保等)的优先清偿地位;制定详尽可操作的学生安置应急预案,最大限度保障学生学业连续性。事后,强化责任追究,对抽逃资金、违规担保等行为依法追究,显著提高违法成本,形成有效震慑。

民办高校分类管理改革是推动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面对债务风险新挑战,必须坚持法治引领,实施精准监管,并将保障师生权益贯穿于风险防范与治理优化全过程。通过构建“法治保障—精准监管—权益中心”三位一体的协同治理框架,不仅有助于化解当前风险,更能为民办高等教育的长期规范、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筑牢根基,使其更好服务于国家人才培养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作者系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副教授）

构建民办高校债务风险协同治理新格局

辽宁借力 AI 打造海洋产业金融风险防控体系

□ 彭 越

辽宁省“十五五”规划建议将海洋经济确立为打造东北振兴“蓝色引擎”的战略支点,明确以“提质、扩能、挖潜”为核心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作为沿海省份,辽宁省“老原新”海洋产业集群的发展已经成为落实省级部署的前沿阵地,传统产业亟待升级,优势产业需巩固壮大,新兴产业正快速崛起。省级金融政策亦聚焦科技、绿色、数字金融等重点领域,引导资源集聚。然而,在政策与金融双重驱动下,不同产业因其技术、资产与市场特性的差异,正叠加形成复杂多元的金融风险谱系。因此,在可持续发展视角下,如何运用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构建与“老原新”产业精准适配的智能金融风险防范体系,既是辽宁省海洋经济行稳致远的内在要求,更是保障省级重大战略安全实施、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关键保障。

风险内涵的拓展: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三维审视

高质量发展要求辽宁省拓展对海洋产业金融风险的认知范围,必须从单一的经济维度,拓展至环境、社会与治理的复合维度,非财务风险最终会显性化为金融损失。首先,“老”字号产业的风险与生态环境深度绑定。例如,过度近海养殖可能引发生态退化,导致海域使用许可被收紧或取消,直接威胁相关养殖企业的经营合法性与资产价值。高能耗、高排放的旧式船舶,其资产价值会因日益严格的国际环保规则而加速贬损。其次,“原”字号产业的核心风险在于转型的紧迫性与不确定性。在“双碳”目标下,石化、海工装备等产业的绿色技术改造需要巨额投入,技术

路线选择失误或转型进度滞后,可能导致大量生产设备成为“搁浅资产”,造成银行信贷的重大损失。此外,“新”字号产业的风险则源于其技术前沿性和社会敏感性。新兴海洋项目的选址、建设与运营,若未能充分考虑社区影响、渔业补偿等社会因素,可能引发社会争议,导致项目延期、成本超支,影响投资回报与偿债能力。

人工智能的应用:构建智能化风险防控的三大支柱

面对多维、动态、复杂的风险,传统风控手段显得力不从心。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其强大的数据处理、模式识别和预测能力,能够在以下三个层面构建起更为精准、前瞻的智能金融风控体系。

基于多源数据融合的智能监测与预警体系。传统的风控数据主要来自企业财务报表,视角相对狭窄。人工智能能够系统整合物联网传感器、卫星遥感、港口物流、环境监测、舆情信息等多维实时数据,构建覆盖海洋产业链的“数字全景图”。例如,通过分析特定海域的遥感影像、水质传感器数据和船舶 AIS 轨迹,人工智能可以动态评估一片海洋牧场的生态负荷和潜在污染风险,并对可能引发养殖损失的赤潮、病原等进行早期预警。对于船舶制造企业,人工智能可以分析全球航运市场指数、新燃料技术专利趋势、碳排放政策文本等,预判其手持订单的未来市场风险与技术淘汰风险。这种从“看报表”到“看生态”的转变,使风险预警得以提前,为风险缓释留出宝贵时间。

驱动可持续金融产品的精准定价与创新。金融产品的有效性建立在风险可准确衡量的基础上。人工智能能够处理

海量的非结构化数据,构建出更为精细和动态的企业 ESG (Environment, Social and Governance,即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 风险画像。基于此,金融机构可以实现贷款、保险产品的差异化精准定价,对采用生态养殖模式、进行绿色船型研发的企业给予更优惠的融资条件;对环保表现差、转型滞后的企业提高风险溢价或限制授信。人工智能使得许多过去难以量化的风险变得可建模、可管理,从而催生新的金融产品。例如,基于人工智能对海浪、台风历史及预测数据的学习,可以设计出理赔触发更精准、定价更合理的“海水养殖气象指数保险”。通过分析海洋生态系统固碳能力的监测数据,可以探索开发“蓝碳质押贷款”等新型工具。

实现风险管理与合规流程的自动化增效。可持续发展金融涉及大量环境与社会信息的披露、验证与合规审查,工作繁杂。人工智能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可以自动读取、核验企业项目报告中的关键 ESG 信息,比对监管要求,大幅提升合规审核的效率与准确性。在供应链金融场景中,结合物联网和区块链技术,人工智能可以实现对抵押动产的即时、可信监控,有效防范重复质押、货权丢失等操作风险。通过将可持续绩效指标转化为智能合约的触发条件,可以实现金融资源的“条件式投放”,即仅当企业达到约定的绿色目标时,才可获得下一阶段贷款或利率优惠,确保金融资源能够真正引导实体经济的绿色转型。

生态体系的共建:推动技术落地与协同治理

将人工智能深度应用于海洋产业金融风险风控,并确保其服务于可持续发展目

标,非一日之功,也非单一机构可为,需要构建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支撑生态。首要任务是夯实数据基础。依托辽宁省正在构建的海洋产业数智金融公共服务平台,由政府牵头,联合行业协会、科研机构与重点企业,共同制定海洋产业关键 ESG 数据的采集、披露与交换标准。在确保数据安全与商业隐私的前提下,利用隐私计算等技术,推动跨部门、跨主体的数据可信融合与有序共享,破解“数据孤岛”,为人工智能模型提供高质量的“燃料”。

核心路径是深化跨界协同。鼓励金融机构、科技公司、海洋科研院所及产业龙头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或创新中心。聚焦“近海生态健康评估”“船舶资产绿色溢价”“海洋科创企业信用评价”等具体场景,共同开发专用的人工智能风控模型与解决方案。同时,加强复合型人才培养,培养深谙海洋产业规律并能融通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专业人才,又掌握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技术的专业队伍。

【作者系辽宁对外经贸学院经济学院讲师;本文系2024年度辽宁省教育厅高校基本科研项目“可持续发展视域下辽宁省海洋金融风险防控研究”(编号:LJ132410841009)研究成果】

发现“重复培训”“多年不训”等结构性矛盾,为自上而下的统筹调训、避免多头抽调提供科学依据。利用数据对师资教学效果、课程质量、机构办学水平进行多维度、长周期的综合评价,实现优质资源的自动发现和精准匹配,全面提升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系统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将大数据技术深度融入干部教育培训,能有效推动干部教育培训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从相对粗放转向精准智能,为培养造就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提供强大引擎。

【作者系湖南韶山干部学院教务部副主任、讲师;本文系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系统社科规划青年项目“新时代领导干部改革攻坚能力建设研究”(2025DXX-TQN038)阶段性成果】

运用大数据技术全面赋能新时代干部教育培训

□ 曾 媛

《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要求,“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用好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如何用好大数据思维和技术,对干部教育培训全流程进行系统性重塑,构建精准化、智能化、科学化已成为时代课题。聚焦“精准供给”,破解“供需错配”难题。针对干部教育培训的“大水漫灌”导致的“供需错配”难题,可以尝试构建全国一体化干部培训大数据平台以实现“精准供给”。通过安全、合规地集成干部基本信息、履职经历、考核结果、日常工作、网络学习行为等多源数据,动态描绘干部“能力数字画像”,精准识别其知识结构短板、能力弱项与发展潜力,通过智能算法实现组织需求、岗位要求与个人成长需求的精准对接,推动培训从“通用型”向“定

制型”、从“配餐制”向“点餐制”根本转变。

聚焦“学用转化”,驱动“训用结合”闭环。理论学习与实际应用“两张皮”是影响培训成效的顽疾。通过在大数据平台嵌入干部培训成果转化追踪与智能评估功能系统,可持续、非侵入式地关联分析干部返岗后的相关变化,如相关政策的创新性落实程度、牵头解决复杂问题的案例记录、调研报告中体现的新思路新方法以及分管工作关键绩效指标的改善情况等实际成效,以科学数据指标和转化模型,量化评估培训对实际工作产生的积极影响。同时,将干部在实践中遇到的新困惑、新挑战,自动反馈至培训设计端以优化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从而构建起“精准培训—实践检验—数据反馈—迭代优化”的完整闭环,真正推动学用转化、训用结合。

聚焦“模式创新”,助推“教学相长”革命。传统教学模式在吸引力和互动性上存